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(清)戴震著

東原文集
(增編)

楊應芹編

黃山書社

(清)戴震著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東原文集

(增編)

楊應芹 編

黃山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原文集(增编)/(清)戴震著;杨应芹编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08. 10

ISBN 978—7—5461—0025—8

I. 东… II. ①戴…②杨… III. 戴震(1723 ~ 1777)—全集 IV. B249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2531 号

书 名:东原文集(增编)

作 者:(清)戴震

整 理:杨应芹

责任编辑:韩开元

装帧设计:韩玉英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9

字 数:400 千

版 次: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60.00 元

「輯刊」編印說明

一、編印宗旨 文獻的系統搜集和整理，是從事任何一門學術研究的基礎；對於新興學科來說，這方面的工作尤顯迫切。與傳統學科相比，徽學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學科，大規模、成系統的數據建設工作尚剛剛起步。過去十年間，文書文獻整理方面已有一些標誌性成果面世（如《徽州千年契約文書》等），對於典籍文獻的整理則尚亟待進行。有鑒於此，根據國家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的總體學術規劃，我們整理出版了這套旨在系統收錄徽州典籍文獻的輯刊。

二、收錄範圍及整理形式 本輯刊所收著作，以其中徽學研究資料相對集中為原則；時間以明清為主，兼及其他；整理形式一般為點校，間或收錄分類數據匯編等。擬視具體情況，分輯出版。

三、編校體例及要求 （一）本輯刊為讀本叢書，故一般以簡明為原則，不出繁瑣校記；（二）盡可能使用存世最好的本子為工作底本，校以他本；（三）統一用規範的繁體字排印，具體原則為：甲、通假字一律保留；乙、人名、地名以原書為準；丙、異體字視具體情況酌情保留；丁、意義完全一樣的字，原則上不保留兩種字形。

明清時代的徽州，人文薈萃，著述如林。系統地整理這個地區數百年間與徽學相關的典籍，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。我們懇切希望這項基礎性的工作能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並希望有關方面的專家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批評和指導。

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言
說者遂以思無邪為讀詩之事讀詩皆無邪思也非
之言詩也先儒為詩者莫明於漢王鄭宋子未子然一詩而
以為君臣朋友之辭者又或以為夫婦男女之辭以為刺譏
之辭者又或以為稱美之辭以為他人代為辭者又或以為
己目為辭其主漢者必攻宋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
今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
愈不可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風雖有
自淫詩所以美貞而刺淫則上之教既有時發微而作詩者
猶欲挽救於萬一故詩是貴也三百首無邪思也況乎有本

《毛詩補傳》清抄本
(北京國家圖書館藏)

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

前九年震日。京師南還。始覩先生于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。先生執震之手言曰。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。休寧有戴某者。相與識之也。久冠雲蓋寔見于所著書。而南二討。不知少時未定之。緣以入。又君且不至。鄙童時。方欣幸獲覲先生。而于沈君已憾不及期也。明年則聞先生又歿于家。今徒拜觀先生遺像。曰。校經圖者。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。授受欲隆。未墮蘊藉積久之業。而以授吳之賢俊。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。震自愧學無所就。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。學主是以莫之能窺測。先生涯涘然。

《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》手稿

(北京大學圖書館藏)

前言

楊應芹

一

《東原文集》始由孔繼涵刊刻於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），合計十卷，世稱微波榭本。作爲《戴氏遺書》的一種，故凡見於《遺書》其他著作的文章一般都不再收入《文集》。而段玉裁認爲：「論音韻、論六書轉注、論義理之學諸大篇，不可不見諸《文集》中。」（見《戴譜》附錄）於是在微波榭本《文集》的基礎上，他於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）重新編刊了十二卷本的《東原文集》，這就是經韻樓本。與微波榭本相比，經韻樓本有三個顯著的特點：一、增刊了二十六篇微波榭本《文集》所沒有的文章；二、采取了「略以意類分，次其先後」的分卷方法；三、附刊了《覆校札記》。

增刊的二十六篇文章大致可分爲三種情況。其一，從《戴氏遺書》中選出了十七篇。如《詩生民解》等兩篇選自《毛鄭詩考正》卷三，《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》等六篇原爲《聲韻考》卷四。這些文章對於《遺書》之一的《文集》未免多餘，而對於獨立

成書的經韵樓本《文集》則不可少，它可以反映戴震治學涉及的各個方面。其二，從友人或遺稿中搜求出八篇。如《與丁升衢書》、《族支譜序》等。這一類真正具有補遺價值。其三，誤輯一篇。《記洞過水》一文，既見於《東原文集》卷六，又見於《經韵樓集》卷七。對照比較這兩篇《記洞過水》，內容完全相同，不同之處是題目下，《東原文集》注爲「己丑代」，《經韵樓集》注爲「代壽陽龔導江」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查《戴氏雜錄》原稿方才明白，原來底稿非戴震手筆，而他却對底稿作了親筆修改，並寫了許多眉批。眉批一方面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寓意作了高度評價，一方面又說明作部分文字修改的原因。可見原文作者不是戴震。乾隆己丑（一七六九）夏，戴、段皆在山西，「玉裁主講壽陽書院，先生客文正署中」（《戴譜》三十四年），後來段玉裁便把戴震修改的文章說是戴震所作（詳見《年譜》三十五年），並收入《東原文集》中。而這篇文章的底稿又畢竟是段玉裁的手跡，所以後人又把它收進《經韵樓集》，這才物歸原主。若不是原稿完整地收存在《戴氏雜錄》中，一部《經韵樓叢書》有兩篇相同的文章，其疑團則無以得解。

經韵樓本又漏收了《閩中師友淵源考序》等微波榭本原有的四篇文章，這不能說不是疏忽。

關於卷次，微波榭本按文體分編，這種方法比較簡單，甚至不問文章內容，祇要看題目即可着手進行。而按意類分編，不把握全書每一篇的內容就無從下手。梁啓超《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》爲經韻樓本十二卷分別撰列了大標題（見《飲冰室全集》文集之四十），從這些大標題可以看出，各卷的內容集中，相對獨立；卷與卷之間界限分明，互不交叉。通覽全書，審視每一篇文章的內容，可以說各卷之中沒有一篇文章不在其大標題的統攝之下，由此可見段玉裁按意類分卷之精當。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。

經韻樓本總體分類是精當的，但每一卷中的文章編次却未必無疵可挑。卷一的文章是按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等六經順序來編排的，其中《河間獻王傳經考》作爲涉及羣經考證的文章，放在首篇固然可以，但是《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闕代系考》置於卷末就不妥當了。此文出自《毛鄭詩考正》，題目爲編者所擬，而內容却是針對《公劉》篇義鄭箋「公劉者，后稷之曾孫也」這句話所作的考釋。該篇文章理所當然應置於《周禮太史正歲年解》之前，以與《詩生民解》放在一起，否則就失次了。又如卷六，「書水經注後」（按：實爲《書水經後》）應置於《水經酈道元注序》之前等。

段玉裁的《覆校札記》，大致相當於現代的勘誤表。古代校書，總是找別人的錯誤。事實上誰編刊的書能一點錯誤沒有，然而有誰爲他自己編刊後的書出過「勘誤表」呢？

盡管段玉裁把編校的部分責任推給了臧、顧，但是他畢竟把他編刊的《東原文集》的錯誤刊佈於世。可以說，這是中國古代出版史上第一份「勘誤表」，它的價值和意義遠在其覆校作用之上。一八八四年張壽榮、一九一〇年嚴式誨重刊《東原文集》，均據經韻樓本。

解放後，《東原文集》的刊行主要有三種。一九八〇年五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湯志鈞校點的《戴震集》，其上編爲《東原文集》，下編是其哲學著作《孟子字義疏証》等四種。同年十月，中華書局也出版了趙玉新點校的《戴震文集》，其中卷八《法象論》等九篇文章及卷九《與某書》因已收入中華書局曾出版的《孟子字義疏証》一書，故該《文集》存目未錄。一九九五年，黃山書社出版了張岱年主編的《戴震全書》，《全書》中的《東原文集》，對於「凡出自專著的文章，若文字相同，且在專著中獨立成篇者」，《文集》也是存目未錄。因此，這也是不完整的《東原文集》。

本次整理出版《東原文集》有兩個目的：一是要把戴震的文章盡量收全，使《東原文集》成爲一個完整的本子。二是要作必要的校勘，以消除錯誤，特別是影響大的錯誤。

孔刻微波榭本《東原文集》收有文章一百一十六篇。段刻經韻樓本《東原文集》文章增加到一百三十八篇。張編《戴震全書》中的《東原文集》是以經韻樓本爲底本的，但

因存目而實收者祇有一百一十四篇。本次《東原文集》增編本，收文章一百七十二篇，即在經韻樓本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十四篇，另外還有手書十一札和四庫館校書提要十六篇，總計一百九十九篇。

在增補文中，有三十五篇是戴震的手稿或手定抄件。《汾州府志序》、《屏山石室記》、《讀禹貢札記》等十三篇輯自《戴東原先生文》，《壽陽縣志序》、《黃樞嶺候館闢路記》、《記武舉戴鳴鸞》等十篇輯自《戴氏雜錄》。以上兩種本子的原件皆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。這些文章近一半爲捉刀之作，有的注明「代某某」，有的沒有注明，還有的署了被代者之名，但因係戴氏手跡，故均可物歸原主。手書十一札，據《安徽叢書》影印件。還有一篇戴氏的手跡《束鹿王封村廣福禪林記》，是戴氏著作中唯一的一篇以佛教爲題材的文章，原件珍藏於首都博物館。

二

本次整理《東原文集》之底本，除《記洞過水》一篇之外，均以經韻樓本爲底本，盡量查找其原始出處進行校勘。所校出的問題，有的雖然是一字之差，却大相徑庭。

經韵樓本《東原文集》卷六第二篇文章的題目名「書水經注後」，它的前一篇是《水經酈道元注序》。「書水經注後」爲微波榭本所未收，是段玉裁重編時增收的。段著《戴譜》三十年乙酉載：「是年秋八月，定《水經》一卷……並自記一篇。」按《水經》一卷沒有刊行，鮮爲人知。今查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抄本《水經校稿》和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抄本《水經考次》，就是《戴譜》所記的「《水經》一卷」。所謂「自記一篇」，則書於《水經》卷後，原無題名；而收入《文集》應擬其名爲「書水經後」，這才名實相符。然而段玉裁誤增一字，題作「書水經注後」，則張冠李戴了。

經韵樓本《東原文集》每卷之中的文章編次，或按意類，或按時間。從意類關係來看，先有《水經》，後有《水經注》，研究《水經》的文章自然要置於研究《水經注》的文章之前。按寫作時間，《書水經後》要早於《水經酈道元注序》十年，更應該是《書水經後》在前。然一字誤增，編排失次，文章前後倒置。

編排失次，問題接踵而至。《東原文集》附段氏《覆校札記》曰：「『書水經注後』，此篇刪去二百餘字，以其語已見於前篇矣。」作爲選本的文集，兩篇相連，因「其語已見於前篇」而刪，且出校說明，這也是無可厚非的。但由於編次前後顛倒，被刪的便不是成稿在後的《水經酈道元注序》，而是成稿在前的《書水經後》；且被刪的不是一般內容

的文字，其中正好有戴氏多少年來對《水經注》輾轉推求、反覆考証，方才總結出來的分辨《經》文和《注》文混淆的四大義例。這四大義例是戴震研究《水經注》最大成果的結晶，也是那個時代研究《水經注》的理論頂峰。由於顛倒刪削，致使戴氏研究《水經注》的重大理論發現，被蒙上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時間塵垢。

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，曾發生過一場所謂《水經注》戴氏襲趙案的風波。乾隆時代的酈學，有全祖望、趙一清、戴震三大家。戴震年齒最幼，而他校正的《水經注》却最先刊行，舉世矚目，後來人們把戴校本與晚出的趙一清《水經注釋》相對照，發現內容「十同七八」。有人認為，此乃巨匠們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」，是由於功夫都絕頂到家的緣故；而有人則認為其間必有抄襲，魏源說，「趙氏書未刊以前，先收入《四庫全書》」，「是戴氏在四庫館時先睹預竊」（《書趙校水經注後》）。王國維不但肯定魏源的說法，而且把見趙氏書時間推前到應聘於方觀承修纂《直隸河渠書》時（見《觀堂集林》卷十二《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》）。戴氏入四庫館是乾隆三十八年，應聘於方觀承是乾隆三十三年，殿本《水經注》刊行是乾隆四十年；然而戴震作《書水經後》却是乾隆三十年。如果《書水經後》這篇文章能完璧傳世，世人定會把殿本《水經注》的成就與發現於十年前的四大義例聯係起來，認為是必然的結果，誰還能懷疑戴氏不見趙本就校不出他的《水經

注》呢！胡適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也曾相信戴震襲趙說。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，胡適找到了《水經校稿》，發現段玉裁於《書水經後》所刪去的内容，這才使他改變了原來的看法。魏、王二氏皆非尋常有門戶之見者流，他們若能見到《書水經後》全文，也同樣不會懷疑，更不會把疑點說成「明証」的。

誤增一字釀成了世紀風波，而校正一字却帶來重要信息，或可糾正偏見。下面看《毛詩補傳序》中的一字之差。

經韻樓本《東原文集》卷十《毛詩補傳序》有曰：「先儒爲《詩》者，莫明於漢之毛鄭，宋之朱子。」查孔刻微波榭本《文集》與之同。而塵封了二百年、今藏於國家圖書館的《戴氏經考》（實即《毛詩補傳》），其《序》於「宋之朱子」則作「宋子朱子」。這裏「子」與「之」有何不同？《公羊傳》隱公十一年「子沈子曰」何休注云：

沈子稱「子」冠氏上者，著其爲師也。不但言「子曰」者，辟孔子也。其下不冠子者，他師也。

戴震在《經考》卷二《中古文》中也引用了「子沈子曰」何休注，以論証「康成自以淵源於

安國，故冠『子』於安國之上」（詳見《戴震全書》第二冊，第二三四頁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戴震在《毛詩補傳序》中稱「子朱子」，是他私淑於朱熹，即以朱熹爲師的明証，同時也在說明他與朱熹在學術上的淵源關係。

戴震既以朱熹爲師，又如何看待他對程朱理學的批判，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哲學問題。而翁方綱、方東樹等人認爲這是戴震晚年對朱熹的背叛，則顯然是偏見。戴震批判程朱理學，始於《孟子私淑錄》。據繆荃孫《藝風藏書記》卷一所記述，《孟子私淑錄》作於乾隆十六年春，而《毛詩補傳序》則作於乾隆十八年夏。爲什麼戴震既批判程朱理學，又私淑於朱熹？我看正確的答案祇有一個，即是由有清一代樸學學風所決定的：「所見不合，則相辯詰，雖弟子駁難本師，亦所不避，受之者從不以爲忤。」（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）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，那就是：「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。」

三

爲了保存《東原文集》底本的原貌，增編的文章未按意類分放入十二卷中，而是按其出處，分別置於《文集》之後。標點主要依據《戴震全書》而略有改動。《全書》中相關著作的原整理者：《東原文集》，余國慶、楊昭蔚；《戴東原先生文》、《戴氏雜錄》，胡

錦賢；《與段茂堂等十一札》，朱阿明；《補遺》，胡炳生等。謹此致謝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於安徽大學

〔一〕一說《記洞過水》的作者是龔導江，見臺灣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三本第四分，陳鴻森《〈記洞過水〉非段玉裁所作辨》。

戴東原集序

段玉裁

先生卒於乾隆丁酉，年五十有五。自先生以古學唱，三十年來，薄海承學之士，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，無不知有東原先生，蓋其興起者盛矣。稱先生者，皆謂考核超於前古。始，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，其言曰：「有義理之學，有文章之學，有考核之學。義理者，文章考核之源也，熟乎義理，而後能考核，能文章。」玉裁竊以謂義理、文章，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。自古聖人制作之大，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，得其情實，綜其如終，舉其綱以俟其目，與以利而防其弊，故能莫安萬世，雖有姦暴，不敢自外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」此非考核之極致乎！聖人心通義理，而必勞勞如是者，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。後之儒者，畫分義理、考核、文章爲三，區別不相通，其所爲細已甚焉。夫聖人之道在六經，不於六經求之，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，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。先生之治經，凡故訓、音聲、算數、天文、地理、制度、名物，人事之善惡是非，以及陰陽氣化、道德性命，莫不究乎其實。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，